

從近代上海佛教的復興

看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影響

性力：文殊菩薩圖
劉奕：藏譯來世圖
面裏：日本妙心寺講音菩薩與十六羅漢
柱面：日本奈良藥師寺藥師坐像
畫頁

佛教石

印度佛教自公元前後傳來中國後，與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相融合，不斷變化，到隋唐時發展到極盛，形成許多宗派，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從此以後，其影響滲透到我國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包括哲學、文學、藝術（音樂、音韻、雕刻、建築）、天文、印刷、醫藥以及風俗習慣等等。

佛教在中國，經歷了一個由盛至衰的過程。隋唐時期形成的各個宗派，宋明以後即趨向衰落。這樣，在中國曾經起過重大影響作用的印度佛教，似乎也失去了其固有的魅力。但是，到了近代，特別是在上海，佛教出現了新的轉機，呈現出復興的迹象。不僅新興寺廟眾多，香火旺盛，而且出現了一批從知識分子階層來的佛教居士，他們大力發展佛教文化事業，研究佛學義理，特別是注意研究法相之學。當時上海佛教界曾流行一種說法，叫做「教宗法相，行在彌陀」。意思是研究佛教義理應以法相宗為準，修行實踐則應尊奉淨土宗。他們中間有的人甚至想從佛教義理中吸取一些對當時社會有利的因素，用以教育人們，改造社會。從這一點上看，似乎古老的印度佛教，不僅其影響長期留存在我國

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而且佛教本身，也不會輕易退出中國這個歷史舞台。儘管它有時會出現一些衰象，但一旦遇上合適的條件與時機，仍然會在我國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重新發生巨大的影響與作用。

正是由於如此，我們認為，回顧一下近代上海佛教發展的過程，對其復興的標誌、特點和原因等等，作些必要的論述，這對進一步認識印度佛教在中國社會中所起的影響與作用，或許會有一些幫助。

一、近代上海佛教復興的主要標誌

佛教何時傳入上海，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已很難確定。根據歷來傳說，上海地方的龍華寺塔和靜安寺，早在三國吳赤烏年間（二三八——二五〇）就已經創始。由於佛教文獻對此缺乏具體記載，歷代誌書對此的說法也不很一致，近人對之頗持懷疑態度。一般認為，在南朝梁代，上海地區已出現了不少寺院。唐代，上海佛教已流傳很廣。但是，上海地區的佛教，既沒有像天

台、曹溪那樣，形成一獨立的宗派；也沒有像五台、峨嵋、普陀、九華那樣，成爲佛教聖地。它只是在民間廣爲流傳，出現的名僧不是很多，能撰述佛教著作、弘揚佛教義理的也較少。因此，上海地區的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始終不佔甚麼重要地位。宋明以後，上海佛教隨着全國範圍內佛教的衰落也一蹶不振。直到近代才呈現出復興的景象，成爲全國佛教發展的中心。其主要標誌是：

(一)新興寺廟衆多。

據不完全统计，在抗戰前，上海的新興寺廟已經不少，除原有的數十所古剎外，近代新建的大小寺廟，總數達到一百四十九所，僧尼合計約有三千人左右。抗戰勝利時，上海地區的大小寺廟已增至二百五十所左右，僧尼合計約五千人。上海地區的大小佛教寺廟又增至三百一十一所。當時著名的寺院，除龍華寺、靜安寺、玉佛寺外，主要尚有沉香閣(慈雲寺)、潮音庵、雲居庵、三昧寺、國恩寺、留雲禪寺(海潮寺)、慈修庵、報德庵、法藏寺、海會寺、清涼寺、福慧寺、莊嚴寺和圓明講堂等。

(二)佛教文化迅速發展。

近代以來，上海佛教文化得到迅速的發展，具體表現在：

1. 佛教著作的大量出版。近代以前，上海地區很少有佛教著作流傳於世。近代以來，上海出版了大量的佛教著作。當時除一般的出版機構，如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醫學書局、世界書局、有正書局、亞東書局、泰東書局、大東書局、光華書局、華通書局、公民書局和開明書店等，都先後出版發行了一定數量的佛教著作外，還陸續建立了一批專門編輯和出版佛教著作的出版機構，其中主要有上海佛學書局、弘化社、上海大雄書店、上海般若書局、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佛經流通處、上海功德林佛經流通處、上海大法輪書局等。其中僅上海佛學書局一九三七年的統計，該局曾出版和流通佛學典籍(大藏輯要)二千零二十四種，佛

內明

特稿

從近代上海佛教的復興

看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影響…… 傅教石…… 3

因明三支作法與

邏輯三段論之比較…… 鄭偉宏…… 18

僧侶在中國書法藝術上的

貢獻(續完)…… 田光烈…… 26

筆譚

談佛說修觀法…… 智銘…… 34

特載

虛雲禪語…… 方興…… 37

法海拾貝

世尊爲五比丘說四諦八正道…… 羅無虛講…… 39

佛教文藝

虛雲和尚(續)…… 馮馮…… 43

畫頁

封面：日本奈良藥師寺藥師佛坐像

面裏：日本妙心寺觀音菩薩與十六羅漢

底裏：彌勒來迎圖

封底：文殊菩薩渡海圖

目錄

教通籍一千二百九十五種，共計三千三百一十九種。即使是一般的出版機構，出版的佛學著作亦不少。如商務印書館，前後出版的佛學著作多達三十餘種，書的質量也較高。其中主要有《西藏佛學原論》、《佛教研究法》、《佛典泛論》、《因明綱要》、《現實主義》、《法相唯識學》、《佛教各宗大意》、《佛學概論》、《佛教概論》、《大乘起信論考證》、《相宗綱要》、《唯識研究》、《佛學研究》、《佛教哲學》、《佛教哲學通論》、《原始佛教思想論》、《因明新例》、《因明入證理論摸象》、《因明大疏刪注》、《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史略》、《中國佛教史》、《原始佛教思想論》、《西域之佛教》、《歷代求法翻經錄》等。這些為數眾多的佛教著作，出版發行，標誌着上海近代佛教的復興。

2. 佛教刊物的發行。近代上海先後創辦的佛學刊物不下三十餘種。其中主要有《佛學叢報》（一九一二年十月創刊，狄葆賢主辦，月刊）、《佛教月報》（一九一三年四月創刊，太虛主編）、《佛學月報》（一九一二年創刊，上海佛學月報社發行）、《覺社叢書》（一九一八年十月創刊，太虛主編，季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一九二三年三月創刊，太虛、范古農、余了翁先後主編，季刊）、《淨業月刊》（一九二六年五月創刊，顧顯微編輯）、《心燈旬刊》（一九二六年創刊，太虛主編）、《中國佛教會會報》（一九二九年九月創刊，圓瑛主持，仁山、鍾康侯先後編輯）、《佛學半月刊》（一九三〇年一月創刊，范古農、余了翁等先後主編）、《威音月刊》（一九三〇年一月創刊，謝畏因編輯）、《佛教特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創刊，鄧奠坤編輯，日刊）、《佛學出版界》（一九三三年創刊，余了翁主編，不定期刊）、《佛學研究》（一九三五年二月創刊，上海《新夜報》副刊）、《上海慈航畫報》（一九三三年七月創刊，劉仁航主編）、《上海慈航周報》（一九三五年三月創刊）、《佛教日報》（一九三五年四月創刊，范古農總編輯）、《佛教新聞報》（一九三六年出版，妙性創辦，三日刊）、《覺有情》（一九三九年

十月創刊，陳法香編輯發行，原為半月刊，後改月刊）、《弘化月刊》（一九四一年七月創刊，鍾慧成編輯）、《中國佛教季刊》（一九四三年秋創刊，錫蘭克佩蘭主編、中英文合刊）、《妙法輪》（一九四三年一月創刊，震華主編，原為月刊，後改雙月刊）、《覺羣周報》（一九四六年七月創刊，社長太虛，主編負善、鄒月耀，後改半月刊、月刊）、《佛教公論》（一九四七年創刊，太虛主編）、《覺訊》（一九四七年元旦創刊，方子藩等發行，丁鴻圖編輯，月刊）、《學僧天地》（一九四八年一月創刊，社長白聖，名譽社長持松，月刊）、《佛教英文雜誌》（一九三一年創刊，黃茂林主編，不定期刊）等。此外尚有提倡佛教道德，普勸念佛放生、素食，宣揚因果靈驗等的刊物《護生報》、《大生報》、《羅漢菜》等。著名的佛學刊物《海潮音》也多次在上海印刷出版。這些佛學刊物的發行，是近代上海佛教復興的重要標誌。

3. 佛學院的創辦。為培養青年僧侶，上海有些寺廟和佛教團體創辦了一些佛學院、學社。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華嚴大學（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師創辦），以弘揚華嚴宗教義為宗旨；上海佛學院（一九四二年冬上海玉佛寺遠塵發起創辦，震華任院長），設有佛學、佛史、國文、史地、算術等課程；法藏學院（一九四五年興慈創辦），以培植弘法佈教、住持佛法的僧材為宗旨，設專修、講習兩班；楞嚴專宗學院（一九四五年圓瑛在圓明講堂創辦），主要向學員講解《楞嚴經》，同時也講《華嚴經》、《天台教觀》等；靜安寺佛教學院（一九四五年四月創辦，太虛、持松先後任院長），學制三年；法相學社（一九四八年范古農創辦），學員修學課程根據法相宗「一本十支」進行授課；興慈中學附設育僧會（興慈創辦），設有佛學、佛史等課程；圓通講寺佛學研究社（一九三六年靈岩創辦，品覺主持教務），講授《法華玄義》、《教觀綱宗》等課。這些佛學院，雖然辦理的時間都不是很長，但卻為上海各寺院培養了一批青年僧材。

4. 講經和電台廣播佛經。近代以來，上海佛教界講經之風大開，一些新興的佛教團體，大都定期邀請佛學名流，開展講經活動。其中主要有：

(1) 世界佛教居士林。曾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三次請太虛演講法相唯識學；一九三三年二月起，請圓瑛講《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九三五年十月，請寶靜講《藥師琉璃光佛如來本願功德經》；一九三七年秋，請弘一講《律藏》一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請范古農講《觀無量壽佛經》；一九四二年九月，請宋培講《大方廣修多羅圓覺了義經》等。

(2) 上海佛教淨業社。於一九二六年二月請興慈講《楞伽經》；十一月，請諦閑講《念佛三昧寶王疏》；一九二七年八月，請靜修講《請觀音經》；一九四一年九月，請緣至講《華嚴普賢行願品》；一九四二年九月，請蘭溪講《地藏經》；一九四八年六月和九月，請清定、能海分別講《菩提道次第》和《華嚴普賢行願品》等。

(3) 上海省心蓮社。於一九三四年冬，請江味農講《金剛經》；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先後請范古農講《大乘起信論》、《觀無量壽佛經》、《小本彌陀經》、《淨土經論》、《大乘入道次第章》、《八識規矩頌》等。

此外，開展講經活動的佛教團體尚有中華崇德會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和十二月，先後請能禪講《大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和《佛說阿彌陀經》；一九三九年四月請興慈講《藥師如來本願經》；一九四〇年五月請寶靜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一九四一年二月請應慈、妙池、隆泉、范古農、汪毅人、張純華等講四十卷《華嚴經》；同年九月請雪相講《地藏經》；一九四三年二月請圓瑛講《勸證菩提心文》等。頻伽精舍於一九二二年先後請月霞講《楞嚴經》、《圓覺經》、《妙法蓮華經》等。法明學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請湯住心講《顯密二宗大小二乘精義》；一九四八年一

月起請本光先後講《唯識三十頌》和《唯識觀修法》等。覺社，於一九一九年三月起，請太虛先後講《八識規矩頌》、《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論》、《觀所緣緣論》等。壽聖精舍，一九四七年請覺澄講《佛說阿彌陀經》等。上海蓮華勝會，一九四二年十月請摩塵講《妙法蓮華經》等。上海淨業蓮池海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請靜權講《佛說阿彌陀經》等。大法輪書局，一九四五年三月至四月請范古農、鍾璞山、陸淵雷、陳海量等講佛教經論、佛教故事、通俗佛學常識等。上海佛教醫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請海山講《金剛經》等。中國佛學會上海市分會，一九三六年三月請太虛講《八識規矩頌》等。崇明佛教居士林，一九四二年五月請施宗導、了道講《普門品》和《釋迦應化事略》等。松江佛學會，一九四八年六月請智定講《金剛經》等。

一些著名的佛教寺院也經常邀請佛學大德聚眾講經。如法藏寺，自一九二四年創建以後，每年都開展講經活動。據不完全统计，從一九二五年起至一九四四年止，興慈先後在該寺講《楞嚴經》、《法華經》、《天台止觀》、《坐禪法要》、《六妙門》、《彌勒上生經》、《彌勒下生經》、《彌陀疏鈔》、《大乘妙法蓮華經》等；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六年如三先後講《無量壽經》和《法華經》等；一九四八年清定講《心經》、《金剛經》、《菩提道次第》等。圓明講堂自一九三五年成立後，也經常講經不輟。除圓瑛自一九三六年起先後講《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彌陀要解》、《佛教五乘教義》、《金剛經》、《佛說無量壽經》等外，一九四六年請應慈講《華嚴要解》，一九四七年請覺澄、靜權分別講《彌陀經要解》和《地藏菩薩本願經》等。玉佛寺，一九三四年請圓瑛講《梵網經》；一九四三年請宋培講《維摩詰經》；一九四四年請震華講《地藏經》等。靜安寺，一九四三年請興慈講《阿彌陀經》；一九四五年請芝峯講禪學；一九四六年請太虛講《彌勒成佛經》等。沉香閣，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請興慈連續講《華嚴探玄記懸談》等。海

會寺，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分別由靜權講《藥師經》，宋培講《金剛經》等。福慧寺，一九四二年請道根講《藥師經》；一九四四年六月和十月，分別請妙慧講《阿彌陀經》、興慈講《大懺悔文》等。清涼禪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分別請覺澄講《楞嚴經》、應慈講《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等。報德庵，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請興慈和應慈分別講《普門品》和《法華經》、《大乘起信論》等。圓通寺，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五年，請諦閑和海印分別講《華嚴普賢行願品》和《彌陀經要解》等。莊嚴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請興慈、應慈、宋培講《阿彌陀經》等。地藏寺，一九四〇年四月請慧登講《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等。此外，太虛於一九三五年先後在龍華寺、雪竇寺下院講戒學和《地藏本願經》，一九三六年在觀音寺講《普門品》；成元於一九四一年在上海天台講寺講《仁王護國經》；了塵於一九四三年在護國禪寺講《心經》；圓瑛於一九三四年在西圓寺分院講《性相通說》等。

近代上海的講經活動，後來還有進一步的發展。一些佛教團體，爲了吸引更多的聽衆，更好地弘揚佛法，利用廣播電台播送佛經，盛況空前。據不完全统计，當時上海先後有十多家電台播講佛經和佛學。其中佛音電台（廣播佛經和佛學的專門電台）和華光電台（佛學書局佛化播音會創設）全日播音不停。據佛音電台一九三四年五月份每天播音的節目單爲：上午八時至九時，早課念經；十時至十一時，念《法華經》；下午一時至二時，唱讚偈及講經；二至三時，播放唱片；四時至六時，文藝節目；六時至七時，晚課念經；七時至八時，誦《地藏經》。後來這一電台還播送了《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和《無量壽經》等。華光電台的播音節目單更爲詳盡。據一九三七年一月該電台每天的播音節目單爲：上午七至八時，由慧參、化定播送早課；八時十五分至九時，由佛化、湮名播誦《金剛經》；九時至十時由慧參播講《成唯識論》；十時至十一時由朱錦華、湮名播誦《普門品》；十一時至十二時由

化定播講《法華經》；十二時至下午一時由朱錦華、佛化、湮名作佛學講解和念佛；一時至二時（每逢星期五）由燈霞作佛學講演；二時至三時由越情播講《華嚴經》；三時至五時先後由道根、隆定播講《楞嚴經》和《圓覺經》；五時至六時由慧參、化定播送晚課；六時至八時先後由本寬和李仁生、傅敬忠播講《涅槃經》和《普賢行願品》；九時至十時由朱錦華播送通俗佛學講演。其他如永生電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先後播講了太虛的《佛教與護國》、寶靜的《天台宗大意》、范古農的《佛學略談》、宋培的《佛教主義及進行佛教意義》和《揀別人法二執》等。心光電台，一九四六年播講了翁慧常、鍾慧成的佛學講演；一九四八年播講了斯雨的《四十二章經》，方子藩的《佛學與科學》，余遂莘的《佛教與人生》，劉昌解的《佛教概要》等。勝利電台，於一九四七年先後播講了慧舟的《地藏經》和道根的《法華經》等。聯合電台，從一九四七年十月起，先後有大悲播講《八大人覺經》，黃涵之播講淨土宗要典，胡厚甫播講《寶誌大師大乘讚》，萬少石播講禪宗要典等。李樹德堂播音電台，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先後有道根播講《法華經》、《地藏經》、《楞嚴經》、《彌陀要解》等。光明電台，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分別由芝峯播講《彌陀要解》，了願播講《阿彌陀經》和《首楞嚴經》，慧舟播講《三昧水懺》，慧參播講《楞嚴經》等。民本電台，一九四七年由道根播講《法華經》等。公建電台，一九四八年由大悲、清定、黃涵之、胡厚甫輪流播講佛學。大中華電台，一九三六年由李仁生、梵行分別播講《金剛經》、《心經》等。市音電台，一九三六年由傅敬忠、李仁生講《彌陀經》等。妙音電台，一九四一年由道根、慧參先後播講《法華經》和《楞嚴經》等。利利電台，一九四一年由慧耀、通賢先後播講《六祖壇經》和《阿彌陀經》等。民生電台，一九三九年七月由仁慈播講《楞嚴經》等。兩友電台，一九三九年九月由慧參播講《妙法蓮華經》等。華英電台，一九三九年九月由道根播講《妙法蓮華

《經》和《梁王懺》等。

以上這些講經活動和電台播送佛經，擴大了佛教的影響，標誌著近代上海佛教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5. 大藏經的刊行。近代上海佛教界，先後刊行了多種版本的大藏經。其中有：

(1)《頻伽精舍大藏經》。這是我國第一部用鉛字印刷的大藏經。一九一三年，由宗仰主持，在上海頻伽精舍以日本弘教書院編印的《縮印藏經》為底本，改用四號活字排印，於一九一三年完成。全藏裝為四十函，分訂成四百一十四冊，收經、律、論一千九百一十六部，八千四百一十六卷，以千字文編函號，有總目一冊。此藏雖然排印中疏漏較多，但作為第一部鉛字排印本，使用比較方便，現為我國常用藏經版本之一。

(2)影印日本《續藏經》。一九二三年，由學術界和佛教界人士丁傳紳、史一如、梁啓超、蔡元培、韓德清、范古農、黃炎培、蔣維喬等六十四人發起，將日本藏經書院編印的《續藏經》，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發行五百部，流通全國。

(3)影印宋版《磧砂藏》。一九三一年，由朱子橋、葉恭綽、狄葆賢、蔣維喬、丁福保、釋范成等發起，在上海成立上海影印磧砂版大藏經會，然後派人至西安開元、臥龍兩寺，攝取南宋《磧砂藏》底片，運回上海改為方冊本影印，委托上海佛學書局分期出版發行。一九三六年全藏出齊，共印五百部。影印時缺失部份，以資福本、普寧本、景定陸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樂南藏本等補入。分裝六十函，五百九十三冊。其中經文五十九函，五百九十一冊，目錄一函二冊。

(4)影印《宋藏遺珍》。一九三三年范成在山西省趙城縣霍山廣勝寺發現金代雕印的《大藏經》，因名《趙城藏》。一九三五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葉恭綽選出其中特有而為其他各版藏經中缺少的孤本佛教經籍，共四十六種，二百四十九卷，縮影成方冊本，

編為上、中、下三集，綫裝一百二十冊，題名《宋藏遺珍》，由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和北京三時學會發行。

(5)《普慧大藏經》。一九四三年，上海盛幼盦出資發起成立《普慧大藏經》刊印會，匯集南、北所傳諸經論，校勘前代經本文字之異同，廣採各藏未載之重要典籍等。由芝峯、持松、范古農、李圓淨等編纂，經過數年經營，印出單行本一百冊。內容包括部份其他各版經未收的經、論、疏釋及由日釋本轉譯的南傳大藏經部分經篇。因未編印完畢，發行面不廣。

(6)《華嚴經疏鈔》。一九三九年，蔣維喬等在上海發起組織華嚴經疏鈔編印會，推應慈為理事長，葉恭綽、蔣維喬為副理事長，黃幼希等主持編務。一九四一年冬全稿完成，即計劃募印五百部，每部四十冊。一九四四年春，全書校印完成。新編《華嚴經疏鈔》，用各種不同刊本進行參校，較為完善。

以上這些大藏經的刊行，標誌著近代上海佛教文化事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三) 中外佛學交流和漢藏佛學溝通

1. 中外佛學交流。近代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中外佛學交流的中心。日本佛學非常流行，一些留學日本的學者，也往往對佛教感有興趣。他們回國後，常寓居滬上宣揚佛學。有些學者受他們影響，開始翻譯日本佛學者的著述。如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了張絨譯日本上野清原著《佛教哲學》（一九二五），賀昌羣譯日本羽溪了諦著《西域之佛教》（一九三三），高觀廬譯日本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著《印度哲學宗教史》（一九三五），歐陽翰存譯日本木村泰賢著《原始佛教思想論》（一九三三）等。中華書局出版了歐陽翰存譯日本神林隆淨著《密宗要旨》（一九三九）等。上海佛學書局出版了聽雲、海秋譯日本島田墨雷、生田德能著《三國佛教史》（一九三〇），震旦佛教會譯日本藤宏憲等著《真言宗小史》（一九××）等。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也是參考了日本織

田德能、望月信亨等人所著《佛教大辭典》編纂而成。這些翻譯著作的出版，標誌着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開始。

與此同時，一些去日本學法的留學僧，回國後也大都到上海傳法。如大勇在日本高野山寺修密教，傳法灌頂，得阿闍黎位。一九二三年回國後，即在上海開壇傳法。顯蔭在日本高野山學密，受灌頂法後，於一九二五年回國，即寓居上海開北錫金公所，弘傳佛教。談玄在日本得台密、東密兩大支派密教傳法灌頂學位，一九三五年回國時攜帶不少中國早已失傳的佛教經籍和密教應用法物，曾在上海佛學書局作公開展覽，頗得上海佛教界的歡迎。持松在日本，於高野山學金、胎兩部大法，得真言宗五十一世阿闍黎位。一九二七年回國後即留居上海，於功德林、淨業社等地講經弘法。此後雖往來於漢滬等地，但大部分時間寓居上海聖仙寺。一九四七年起，任上海靜安寺住持。後即在寺內建立真言宗壇場。同時撰著密教著作多種，使久已失傳的密法又重新在上海得以流傳。此外，到日本學習密法的還有曼殊揭諦與王弘願，入日本佛教大學學習的有天慧、仁性等。他們回國後弘傳佛法，也對上海佛教界有影響。

當時，前往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留學的僧人也不少。如赴印度留學的僧人有體參、岫廬、法舫和白慧等；赴錫蘭留學的有僧人惟幻、法周、慧松、唯實、了參和居士黃茂林等；去緬甸留學的僧人有達居、善觀等；到暹羅（今泰國）留學的僧人有悲觀、等慈、性教、覺圓等。這些僧人和居士留學歸來後，雖然並沒有都到上海進行弘法傳教的活動，但他們都從各個不同方面，對交流中外佛學思想作出了貢獻。如他們傳譯這些國家的佛學著作，介紹他們的佛學研究方法，整理他們的佛教文獻資料等等，都對上海佛教界有影響，從而促使上海佛教界加強了對佛學思想的研究。

2. 漢藏佛學溝通。近代上海的佛教學者，對單憑漢譯佛典來

研究佛教，已感不足。於是，開始重視對藏文經典的研究和西藏佛教的介紹。上海的出版機構在不長的時間裏，陸續出版了一批西藏佛學著作，其中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呂澂著《西藏佛學原論》（一九三三）、中華書局出版的李翊灼著《西藏佛教史》（一九三三）、上海佛學書局出版的妙舟著《蒙藏佛教史》（一九二九）、李翊灼著《西藏佛教略史》（一九二九）、法宗著《西藏佛教略論》（一九三一）等。另外，《東方雜誌》還刊載了張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一九一一），君實的《中國之喇嘛教及回教》等論文。這些著作和論文的刊行，為漢藏佛學的溝通，打下了基礎。

為了進一步溝通漢藏佛學，上海的一些佛教團體，一方面邀請入藏求法的高僧，來滬講經說法，介紹西藏佛教的情況，如二次入藏學習密法的能海，就被多次請來上海講演西藏佛法。另一方面又直接邀請西藏佛教的大師來滬講經傳法。如一九二四年，九世班禪應邀來滬講經，傳授釋迦牟尼心咒，聽眾上千人。其後白喇嘛、多杰尊者、安欽、喜饒嘉措等均先後被邀來滬說法、修法、灌頂。一九三四年，九世班禪再度應邀來滬，發起組織菩提學會，弘揚藏傳佛教。一九三五年菩提學會成立後，即以譯印西藏密教經典為主要任務。在榮增堪布的主持下，先後譯出宗喀巴的《菩提正道菩薩戒論》，月宮的《菩薩戒二十頌》，安慧的《唯識論釋》，《西藏文典》以及五種密乘典籍，即《大威德金剛一尊略軌》、《咕嚕咕勒佛母成就法》、《遷轉心要》、《光蘊遷轉法》、《加持舌法》。一九三七年九世班禪逝世後，上海佛教界除舉行盛大追悼會外，又於一九四〇年在覺圓上海佛教淨業社成立班禪紀念堂，由榮增堪布主持。此後常在此紀念堂傳修密法。一九四八年能海來滬，在班禪紀念堂講經，並命弟子清定籌建金剛道場，作為專修格魯派密法的場所。以後能海等經常在此講經、傳法、灌頂，對上海傳播格魯派密法影響頗大。

此外，西藏寧瑪瑪派的諾那尊者，也於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五

年二次來滬修法、傳法。後有其弟子在滬設立諾那精舍。一九四八年，諾那的另一傳法弟子蓮華正覺(王家齊)，又在滬創立蓮華精舍。這二個精舍，後即成爲弘傳寧瑪派密法的專門場所，經常在此舉辦法會、講經、灌頂，在上海有一定影響。

中外佛學的交流 and 漢藏佛學佛教的溝通，也是近代上海佛教復興的表現。

二、近代上海佛教復興的主要特點

近代上海的佛教，出現了復興的景象，但它不是我國隋唐時佛教盛行狀況的再現，而是帶上了許多時代的特點。

(一) 寺院經濟的資本主義化。

長期以來，我國寺院經濟的主要來源，大都是依靠土地收入和地主、官僚的捐獻。近代上海的寺院，其經濟來源，主要靠工商、資本家的捐助和房地產收入。有的寺廟本身偶而也經營一些工商業。一些小寺廟則依靠僧人趕經懺來維持。如上海報德庵的建立，主要是依靠第一代住持道源(尼)之父、廣東香山巨商徐國林集資百萬而成。法藏寺的創建，也主要是得到了王一亭等人的贊助。圓明講堂的堂址和建設，也是得之於一個居士的資助。而一些較大的寺廟如龍華寺、靜安寺、玉佛寺等，其經濟來源除了商人、資本家奉獻外，主要靠房地產收入。這和單純利用土地收租的形式作爲經濟來源的一些寺廟有所不同，明顯地帶上了資本主義的色彩。

(二) 佛教信仰和佛教儀禮的變化。

近代上海的佛教信仰，出現了佛道不分、佛教和民間信仰混同的現象。有些寺廟，既供佛教的佛、菩薩像，也供道教的神仙像，甚至有民間所傳的各種祖師像夾雜其中，關帝和觀音同在的情況非常普遍。一般善男信女，對觀音的崇拜，超過了對釋迦牟尼的信仰。在佛寺中，觀音的地位非常突出。大多數寺院在大雄

寶殿三世佛後面，都有大型的觀音壁塑像。有的還專門建立殿堂，稱爲大悲殿(閣)或觀音殿(閣)等。觀音也被稱爲「白衣大士」、「南海大士」、「慈航大士」等，被看成是「救苦救難」的化身。信仰的目的，也逐漸由單純的修來世、求解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等轉變爲同時追求現世利益，祛病消災，增福延壽。「有求必應」成爲廣大民間佛教徒的一種信念，而「臨時抱佛脚」成爲寺廟進香人多的主要因素。佛教信徒參加放生會和保護動物會，禁止殺生，奉行素食。佛教儀禮除誦經念佛外，還特別盛行各種懺法，如瑜伽焰口(施餓鬼)、梁王懺、慈悲水懺、金剛懺、大悲懺、打佛七、做水陸道場等，均以超度亡靈、追悔罪惡、保佑子孫平安爲目的。由於經懺的盛行，當時上海曾出現了一批專以拜經懺爲業的經懺僧，上海有些小寺廟，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建立起來的。

(三) 弘傳佛教的中心由寺院轉向新興佛教團體。

近代上海出現的一些新興佛教組織和團體，不僅開發廣泛的弘法活動，還舉辦各種佛教文化事業和慈善事業，從而成爲弘揚佛教的中心。

1. 近代上海的佛教組織。主要有：一九一二年四月由寄禪創辦的中華佛教總會；一九二六年由施省之、王一亭等發起組織的上海佛教維持會；一九二九年由圓瑛等發起成立的中國佛教會；同年成立的上海市佛教會；一九四二年由正道、關絅之等發起成立的上海特別市佛教會等。這些羣衆性的佛教組織，在團結廣大佛教徒，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整理僧伽制度，建立佛教教育組織，推動寺廟與辦慈善公益事業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績。特別是中國佛教會，在抗日戰爭時期，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如組織僧侶救護隊，救護傷兵和難民。

2. 近代上海的佛教團體。近代上海新興的佛教團體甚多，其中活動多、影響大的有：

(1) 世界佛教居士林。一九二二年八月成立。周舜卿、施省之、王一亭、范古農、游有維等先後任林長。林友最多時近三千餘人。主要林務為弘揚佛法，包括通俗演講、流通佛經、研究佛學、出版林刊等。其福利事業有施醫、施藥、施材、施衣、施米、施粥等。修持則有佛七、水陸、助念等。此外還設有仁惠小學和佛學圖書館等。

(2) 上海佛教淨業社。一九二二年成立。為專修淨業的念佛道場。關絅之、聞蘭亭、黃涵之先後任社長。設有念佛堂、閱經室、學教部和放生會等。一九二六年起出版《淨業月刊》。平時除聚眾念佛外，還定期邀請佛學名流宣講大乘經典和佛法要義。

(3) 上海佛教功德林。一九二二年四月開幕。原設蔬食處和佛經流通處。前者意在以提倡蔬食來推廣佛教，後者則專以流通佛經、法器為職誌。一九四二年起，擴大範圍，將原有十號聚餐會改為世界提倡素食會，以提倡素食、戒殺護生、敷揚佛化為宗旨。會內分設修持、閱經、演講、問答、教經、聚餐六部分，在當時有一定影響。

(4) 上海市佛教青年會。一九四六年成立。為抗戰勝利後新增的一個居士團體。方子藩為理事長。以弘揚佛教、修持佛法、舉辦福利事業為重點。曾出版《覺訊》月刊，設立佛學圖書館，主辦新光講學會等。會員約有三千人。

(5) 上海佛學書局。一九二九年成立。原為集編輯、印刷、流通於一身的佛學專業出版機構，因其以提倡佛學、宏揚佛法為宗旨，故在出版發行佛書之外，還附設佛學文會、佛化播音會、佛學研究函授社和佛學流通圖書館等，成為上海弘揚佛教的主要陣地之一。

其他佛教團體尚有：「覺社」、「法苑」、「省心蓮社」、「法明學會」、「佛教徒護國和平會」、「上海佛教公墓」、「上海佛教火葬場」、「法寶館」、「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上海佛教同仁會」、

「上海佛化醫院」、「佛光療養院」、「佛教平民診療所」、「慈光施診所」、「樂園蔬食處」、「淨業省修社」、「中國動物保護會」、「上海佛教蓮社」、「上海鹿苑佛學會」、「印心精舍」、「上海中華戒殺救急會」、「上海佛教慈幼院」、「安養念佛堂」、「班禪紀念堂」、「金剛道場」、「諾那精舍」、「蓮華精舍」、「上海勸募放生宏法基金會」、「上海勸募印送經書基金會」等。這些團體，都從各個不同方面開展了弘法傳教活動。

(四) 居士成為弘法傳教的主要力量。

近代上海湧現出一批知識階層出身的佛教居士。他們知識淵博，信仰虔誠，與政治界、實業界聯繫緊密，活動能力强。這些居士，除了組織各種各樣弘法團體從事傳教活動外，最大的貢獻是開展多種多樣的佛學研究。標誌近代上海佛教復興的一些著名佛教文化團體，如上海佛學書局、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淨業社、上海市佛教青年會等，都是居士組織的團體。為數眾多的佛學刊物，絕大多數也都是佛教居士創辦、編輯的。近代上海出版的一些佛學研究成果，包括佛學理論和佛教史，有相當一部分出自居士的手筆。特別是有一些居士，他們弘傳佛教的目的，除了紹隆佛法，不使佛教衰落外，還想利用佛教教理來教育人們，改造社會，轉變不良的社會風氣。這一切都表明居士已成為上海地區弘傳佛教的主要力量。

(五) 獨立撰述佛學著作，推行現代化的僧教育。

1. 獨立撰述佛學著作。長期以來，一些佛教大德習慣於用註釋經典的辦法來研究佛教。近代上海的一些佛學大師，特別是一些有真材實學的佛教居士，他們從日本佛教學者那裏得到啟發，以新的理論思維方式，現代化的言語，開始獨立地撰著對佛學思想有所發揮的著作，從而在佛學研究的領域裏，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儘管這僅僅是開始，真正有價值的成果還不是很多，而且有些著作明顯地受到日本佛教著述的影響。但這畢竟有了一個開

端。它不僅使佛學思想獲得了新的發展，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2. 推行現代化的僧教育。中國歷來培養僧材的傳統，是寺院採取師徒傳授、認可的辦法。近代上海出現了一些佛學院、學社，它們一改過去師徒傳授的舊傳統，採用了現代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效仿一般學校，實行上課制。教學內容豐富，除了佛學以外，還兼授其他文化、歷史知識。這種現代化的僧教育，標誌着佛教培育僧材，已由過去經院式的教育開始向現代化教育發展。

(六)不拘一宗一派，推行十方叢林制。

1. 不拘一宗一派。近代上海僧人，雖然各有傳承，如應慈自號華嚴座主，寄禪、圓瑛傳禪宗，興慈傳天台宗，月霞傳華嚴宗，持松傳密宗，印光傳淨土宗。但是，他們大都融通各宗思想，不拘一宗一派之說。如應慈一生教演華嚴，行在禪宗，早年還得法於冶開和尚，為禪宗臨濟法派第四十二世。圓瑛曾傳臨濟、曹洞兩派法脈，但後來卻深信淨土念佛法門。平時主張天台、賢首並弘，禪宗、淨土雙修，尤專精於《楞嚴經》。興慈一生，雖教演天台，卻行傳淨土，以弘揚淨土為職志。他所創的法藏學院，培育僧材，即依天台教規為指南，以淨土法門為歸宿。月霞弘揚華嚴，創辦華嚴大學，但根本卻在禪宗，所謂無一日不坐香參禪，無一年不打禪七，四十年未敢一日離開。持松早年曾學天台教義，旋又嗣法丹霞，傳禪宗臨濟法系，後來才學真言宗於日本，得第五十一世阿闍黎位。他除著有《密教通關》、《真言宗朝暮行法》等密宗撰述外，還有《華嚴教義始末記》、《攝大乘論義記》等顯教著述多種。印光一生弘揚淨土，被奉為中興淨土的第十三祖，但也是一位禪教俱通的人物。一代大師太虛，為法相宗一大家，但對經、律、論三藏，各宗要義，各家學說，無不淹通。至於一些知名的佛教居士，更是不拘一宗一派，對各宗學說

全面加以研究，對各派教義平等加以弘揚。如范古農、初台、賢並弘，後對法相特有研究，同時稱揚淨土，對三論亦有所論及。江味農，初學禪法，後東渡日本專究東密。但一生教主般若，行在彌陀，曾被推為省心蓮社社長。其他如丁福保、蔣維喬、王一亭、關綱之，黃涵之、方子藩等居士，也大都是融通各宗的人物。

2. 推行十方叢林制。近代上海的寺廟，大都為十方叢林制。一些原來屬於剃度派的子孫廟，有的後來也陸續改為十方叢林制。如雲居庵，原為剃度派尼庵，一九〇一年改為十方選賢制。三昧寺，原來也是剃度派寺廟，一九四八年改為十方選賢制。靜安寺在清咸豐以來，也屬剃度派的子孫廟，一九四七年改為十方選賢叢林。龍華寺也是在一九三四年恢復為十方叢林制的。一些新興的寺廟，如法藏寺、海會寺等，都屬於十方叢林。所謂十方叢林，即寺廟的住持，不是師徒剃度相承的世襲制，而是在官方或地方羣衆的監督下，由十方諸山大德長老推選賢能擔任。這種制度，較之剃度世襲制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

(七)注重法相唯識學的研究。

近代上海的佛教界(包括僧人和居士)，雖都融通各宗思想，不拘於一宗一派，但一些著名佛教學者對佛教理論的研究，大都注重法相唯識之學。所謂「宗教法相，行在彌陀」。一代佛學大師太虛，是學世公認的法相唯識學專家。他在上海創建的覺社，主要弘揚法相唯識之學。他先後在社內講了《八識規矩頌》、《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等許多法相宗的基本論典。當時上海的《神州報》曾在此發表《中國唯識學之復興》說，認為太虛「在覺社開講唯識宗學之綱要」，乃「學術界之好消息」。所著唯識學著作《真現實論》和《法相唯識學》，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影響很大。知名的居士范古農、唐大圓等，也都對唯識思想深有研究。范古農不僅常講唯識要典，而且專門創設了法相學社，以法相宗

的「一本十支」作為學員的修學課程。平時常勸人以法相為宗。唐大圓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多次講解唯識之學，同時出版了許多通俗的唯識小冊子，如《唯識方便讀》、《唯識三字經》、《唯識易簡》、《唯識的科學方法》等。在這些著名佛教學者的大力提倡下，一時間，上海曾出現一股研究、學習法相之學的熱潮。

三、近代上海佛教復興的主要原因

佛教之所以能在近代上海這塊土地上得到復興，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有：

(一)近代上海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為佛教復興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1. 近代上海，由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很快成為全國經濟發展的中心。一些商人、資本家在經營中發了財，常常慷慨解囊，對佛教進捐獻和資助。而一些小商小販和個體經營者，為求得生意興隆，財源茂盛，也經常進廟燒香，奉獻香金。這不僅使得一些古老的寺廟都有了雄厚的經濟基礎，而且在不長的時間裏，還新建了一批寺廟和新型的佛教團體。所有這一切，都為上海佛教的復興奠定了物質基礎。

2. 隨着經濟的迅速發展，近代上海的文化事業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當時上海現代化的印刷出版事業，始終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為數眾多的出版機構和報章雜誌，使出版佛教著作、弘揚佛學思想有了廣闊的園地。同時，佛教界本身也憑借着上海優越的印刷條件，創辦了一些專門刊印佛教典籍的書局和弘揚佛學的刊物，從而使上海佛教的復興，有了更為有利的物質條件。

(二)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在近代仍有影響。

1. 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在印度本土雖早已衰亡，但在世界上，直到近代仍有深遠影響。這表現在不僅南亞一些國家，至今佛教仍特別興盛，有的還作為國教，而且在西方一些國家，近代

也相繼建立起一些佛教組織和僧團。一些思想家和哲學家也開始對佛教及其思想發生了興趣，從而進行研究，並取得了一些成果。尤其是日本，近代佛教特別興盛，佛學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們有大批的佛教學者，為數眾多的佛教院校(系)和佛教學術研究機構，發行了各種各樣的佛學刊物，出版了大量的佛學著作。近代上海，處於中外文化學術交流的中心，西方世界特別是日本對佛教及其思想的重視，不能不引起上海學術界和佛教界的注意，促使他們對佛教及其思想進行探索和研究的，從而為佛教在上海的發展增添了動力。

2. 印度佛學思想在近代中國曾被一些思想家和革命家用作思想武器。維新派人物譚嗣同，運用佛學中的「無我」、「無畏」思想，衝擊一切封建網羅，最後以「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大無畏精神迎接犧牲，為維新運動譜寫了悲壯的一幕。梁啟超認為，只有利用佛教的「大無畏」精神，才能陶冶出轟天震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物。章太炎認為，搞革命必須「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他根據佛教中「自貴其心，不他力」的教義，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強調民族自尊心的思想，發揚了「頭目腦髓，都可施捨於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勇猛無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戰鬥氣概，鼓舞人們去進行革命鬥爭。這些思想家和革命家從佛教中吸取精神力量去進行變法、革命的言論和行動，給上海學術界和佛教界以深刻的影響，促使他們加強對佛教及其思想的研究，從而推動了佛教在上海的發展。

3. 印度佛學思想曾受到近代一些哲學家 and 學者的重視。近代有些哲學家 and 學者，非常重視對佛教及其思想的研究，有的還把它作為建立自己理論體系的根據。當時一些重要的文科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武漢大學、東北大學和成都大學等，都開始講授佛學。胡適、馮友蘭等在編寫《中國哲學史》時，都寫進了佛學。熊十力依據佛學寫出了他的《新唯識論》。梁啟超

在講中國學術史時，也專門講了佛學。這些都對上海學術界和佛教界有影響，使他們重視佛教及其思想的研究，從而促進了佛教在上海的發展。

4. 印度佛教思想被一些人用以教育人們、改造社會、轉變不良的社會風氣。金陵刻經處創始人楊仁山早就把佛教看作是「濟世之方」。上海的一些高僧大德和知名居士，也認為佛法可以用來教育人們，改造社會、轉變不良的社會風氣。如圓瑛曾大力宣揚佛教的「積極救世」思想。認為佛教是「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他把「大慈悲、大無畏、大無我三種精神學」，看作是「佛教大乘救世之學說」，認為運用這種學說來「挽回世道，救正人心」，就能「弭殺機於無形，化戰器為無用」、「致社會國家於和平」。（《圓瑛法匯》，《講演錄》）太虛提倡人間佛教，宣揚教制革命、教產革命和教理革命，認為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用以「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弘一也號召人們「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上海其他一些僧人和居士，大都根據佛教中「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等教義，提倡不殺生，保護動物，建立放生會；並利用講經會、廣播電台，宣傳佛教教義，勸人為善，轉變社會的不良風氣。這一切，也都有利於上海佛教的進一步發展。

以上種種，說明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在近代仍有深遠影響。這些影響，正是佛教之所以能在近代上海復興的思想條件。

（三）不同階層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信仰佛教。

1. 民國以來，戰亂不斷。上海處於帝國主義列強控制之下，租界林立。一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有一部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有一部分，在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感到無所適從。他們不滿現實，卻又無法改變這個現實。他們既反對傳統的儒家思想

想，認為它禁錮人們的頭腦，阻礙社會的進步；又對外來的西方文化思想抱不信任態度，認為不合中國國情，於改造社會無益。正是在這種無所適從的矛盾狀態中，有些人就轉向佛教，想從佛教教義中找到一條救國救民之道。

2. 處於災難深重中的上海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更加悲慘。他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們想到佛教中尋求精神上的安慰，思想上的解脫，於是紛紛信仰了佛教。他們擁向寺廟，在佛、菩薩像前焚香點燭，叩頭跪拜，既求現世利益，也求死後早登西方極樂世界。

不同階層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信仰佛教，從而加速了上海佛教的發展。

（四）各地佛教高僧、佛學名流雲集上海。

1. 近代上海，交通發達，經濟、文化發展迅速，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優越。各地的佛教高僧、佛學名流，經常應邀來上海講經說法，收皈依弟子。可以這樣說，當時全國著名的高僧和知名的居士，沒有一個不來上海進行傳教活動的。他們中間，有的後來即長期留居滬上，進行弘法傳教活動。他們有的廣收徒眾，講經說法；有的著書立說，弘揚佛教教義；有的募捐集資，創辦各種各樣的新型佛教團體和慈善事業。這樣，壯大了信教羣眾的隊伍，增加了佛教活動的場所，進一步擴大了佛教在上海的影響。

2. 上海的一些佛教團體，有計劃、有步驟地把一批佛教學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鼓勵他們進行佛學研究，組織他們講經說法，出版發行他們的佛學著作。如上海佛學書局，把一大批著名佛教學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不僅他們所撰寫的佛學著作，都由佛學書局編輯出版，而且組織他們編寫佛學講義，註釋佛教經典，撰著佛教通俗讀物、專著和論文。還組織他們定期到各有關團體講演佛學，到特約的電台播講佛經和佛學論著。

正是由於各地的佛教高僧、佛學名流雲集上海，才使近代上海的佛教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復興景象。

四、知名佛教人士在近代上海佛教復興中的貢獻

(一)近代上海佛教復興中的著名僧人。

1. 諦閑(一八五八——一九三二)，在一八八四——一八八七年間，曾於龍華寺學教、受記。一八八八年起，在龍華寺開講《法華經》、《楞嚴經》等。一九一三年在上海留雲寺(海潮寺)佛學研究社主講《八識規矩頌》、《圓覺經》等。從一九二二年起，每年都到上海淨土庵、圓通寺、玉佛寺、佛教淨業社、世界佛教居士林等處輪流講經，宏揚天台教觀。近代上海天台宗的興起，同他的大力宏揚有關。

2. 太虛(一八八九——一九四七)，早年在上海靜安寺舉行寄禪逝世的追悼會上，曾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的口號。後又撰文宣傳佛教復興運動，建立新的僧團制度，在上海佛教界引起很大反響。一九一八年在上海與蔣作賓、章太炎、王一亭等組織覺社，出版《覺社叢書》(後改為《海潮音》)，其專著《整理僧伽制度論》也開始在刊物上發表。其後，在主持覺社期間，先後在社內演講《二十唯識論》、《八識規矩頌》、《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等，弘揚法相唯識學。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創辦佛法僧園——覺苑。抗戰勝利後，在上海玉佛寺創設覺羣社，出版《覺羣週報》。所著《眞現實論》、《法相唯識學》等發表後，對上海唯識學的復興有很大影響。

3. 圓瑛(一八七八——一九五三)，曾在上海創立圓明講堂，組織圓明蓮池念佛會。一九四五年又在圓明講堂創辦楞嚴專宗學院，招收青年僧侶三十二人，每日講經。抗日戰爭期間，曾在上海召集蘇滬僧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後為籌集經費支援救濟

事業，曾二次偕其徒明暘赴南洋各地向華僑進行募捐。一九三九年偕徒明暘回國後，即被日軍以抗戰分子論處而逮捕，解往南京憲兵司令部，企圖誘使他與日本合作，遭到拒絕，一月後始釋放回滬。他在滬期間，經常赴各處講經。講得最多的是《楞嚴經》，前後達十三遍。一九四九年開始撰著《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共二十四卷，現已出版發行。他的講經弘法活動，對近代上海佛教的復興有很大影響，故在建國後被推為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

4. 應慈(一八七二——一九六五)，早在一九一四年，曾協助月霞在上海愛儂園開辦華嚴大學。一九四〇年又創辦華嚴學院於上海上濱灣，在院內開講六十《華嚴》，歷時二年。後與葉恭綽、蔣維喬等發起組織「華嚴經疏鈔編印會」，任理事長，編印《華嚴經疏鈔》。一九四三年起，駐錫上海沉香閣(慈雲寺)，講解華嚴經論，從而使沉香閣成為弘揚華嚴宗的道場。

5. 興慈(一八八一——一九五〇)，一九一八年起，先在愛儂園講《天台四教義集註》，後住上海超塵精舍，講經傳教。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創建法藏寺，並在寺內設立法藏學院。其間，還創辦法雲印經會，刻印古德經疏數十種。一九四〇發起成立上海佛教同仁會，被推為會長。一九四六年在法藏寺創設慈光補習學校，為一般清寒子弟免費施以初中教育。一九四七年正式創立興慈中學，培育人材。一九四九年又於法藏寺設慈光施診所，聘中西醫四名，為貧病者施診給藥。所創法藏學院，以天台教觀為指南，對天台宗在上海的復興，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6. 月霞(一八五八——一九一七)，一九一四年經狄葆賢推薦，到上海愛儂園創辦華嚴大學，專弘華嚴教義，學員有持松、戒塵、常惺、慈舟等八十餘人。後因異教徒的破壞，華嚴大學不久即遷移杭州海潮寺，月霞也隨之離開上海。他在滬弘法時間雖不很長，但因他所創華嚴大學是近代上海第一所佛教大學，故對

近代上海重興華嚴宗有很大影響。

7. 印光(一八六一——一九四〇)，從一九一八年起，其文稿即在上海《佛學叢報》上陸續發表，對上海佛教界有所影響。一九二二年，爲印書事來到上海，住太平寺，居士施省之、王一亭、關綱之、黃涵之等常前往問法，引起廣大佛教徒的注意，前往要求皈依者日衆，太平寺一度成爲他在上海弘法利生的道場。由於他廣印淨土經書和《印光文鈔》，皈依者又多，上海的淨土宗風即由此而盛行起來。世界佛教居士林的蓮社和上海佛教淨業社等，都是由於他弘揚淨土而相繼建立。一九三一年他又創辦弘化社，刊印佛書。一九三六年，他在覺圓佛教淨業社啓建的護國息災法會上破關說法，前往皈依者千餘人，使淨土宗風更大振於上海。印光逝世後，在上海覺圓法寶館成立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並發行《弘化月刊》，更使上海淨土宗風持久不衰。

8. 震華(一九〇八——一九四七)，一九四二年起，任上海玉佛寺住持。其間會創辦上海佛學院，自任院長兼教務主任，有教師十餘人，學僧三十人。後在玉佛寺成立弘一大師紀念會圖書館，收藏佛教典籍，計有王少湖捐贈法相典籍二百餘冊，丁福保捐贈內外典籍數千冊，以及《續藏》、《頻伽藏》、《大正藏》等。一九四三年創辦《妙法輪》月刊，任主編，宣揚佛教理論。他在滬弘教時間也不長，一九四七年即病逝，但對上海佛教的復興也有一定貢獻。

在近代上海佛教復興中有所貢獻的高僧還有持松、大勇、顯蔭、談玄等，他們都爲上海密宗的重興作過貢獻，這在前面已有所論及。還有其他一些，也不一一列舉。

(二) 近代上海佛教復興中的知名居士。

1. 范古農(一八八一——一九五二)，自一九一八年皈依佛教後，即往來於上海等地弘法講經。一九三一年起，任上海佛學書

局總編輯，發行《佛學半月刊》，編輯《佛學小叢書》和《佛學百科叢書》等。一九三五年任上海《佛教月報》主筆。一九三八年任省心蓮社主講《三十唯識頌》和淨土三經一論。一九四七年組織法相學社，親自主講法相唯識之學。晚年被選爲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一生以弘揚佛法爲己任，勸人以法相爲宗，以淨土爲歸。其對近代上海佛教復興之貢獻，在居士中實屬少見。

2. 江味農(一八七二——一九三八)，早年在日本高野山專究東密，返國後與人一起在上海籌設功德林佛經流通處，滙集南北刻經處及名山各種經版刻印流通全國，弘法利生。一九三〇年秋在上海開講《大乘止觀》。後被推舉爲省心蓮社社長，經常在社中宣講《大乘經典》。一生對《金剛經》頗有研究，著有《金剛經講義》，出版後受到佛教學者的重視。他對近代上海佛教的復興有一定貢獻。

3. 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一九〇五年始讀釋氏語錄，其間結識佛教學者楊文會，聞佛法要義。一九〇八年到上海行醫，創辦醫學書局。一九〇九年赴日本考察醫學，回國後繼續在上海刊書行醫，並研究佛教，刊印佛書。此後編寫通俗的佛經註解多種，先後出版有《一切經音義提要》、《佛經精華錄箋註》、《六祖壇經箋註》、《佛學指南》等。一九二二年開始編纂《佛學大辭典》，一九二二年正式出版，在上海佛教界影響頗大。

4. 蔣維喬(一八七三——一九五八)，一九二九年起任上海光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前後執教二十餘年。他研究佛教有素，經常閱讀、演講佛經，並「依照佛法，進行修持」。一九二三年，與梁啟超、蔡元培、范古農等在上海發起影印日本《續藏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一九三一年又與葉恭綽、丁福保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上海影印磧砂版大藏經會，影印《磧砂藏》，委托上海佛學書局出版發行。所著《中國佛教史》、《佛學淺測》、《佛學綱要》、《佛學概論》等，在上海佛教界有一定影響。

5. 狄葆賢，生卒年不詳，一九一二年起在上海開辦有正書局，出版佛教經書和佛像數百種，一時風行海上。所辦《佛學叢報》，為我國近代首創的佛學刊物。曾推薦月霞至上海創辦華嚴大學。一九三一年與葉恭綽等在上海發起影印宋版《磧砂藏》。他以出版佛書，創辦佛學刊物、影印藏經等方式，為近代上海弘傳佛學開闢了新的道路。

6. 黃涵之（一八七五——一九六一），對淨土宗頗有研究。曾任上海佛教淨業社社長、法明學會副會長，為上海近代傳播淨土宗影響較大的人物之一。所著《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初機淨業指南》等，由弘化社、佛教書局多次出版發行，總數達幾十萬冊，被上海佛教界稱為初學者的入門良書，在中下層信眾中有廣泛的影響。

7. 唐大圓（？——一九四三），早年因聽太虛講《成唯識論》而對唯識學發生興趣，後研究多年，終有所成就。一九二五年起，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名譽講師，在林內講《唯識方便談》等。又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編輯，先後在該刊發表《佛法不壞世法論》、《平心之論》、《出家勝義》等佛學論文。世界佛教居士林還出版了他的《唯識方便談》、《唯識三字經》、《唯識的科學方法》、《唯識易簡》等小冊子多種，深入淺出，文筆生動，在上海一般知識分子中起了比較普遍的影響。

其他在近代上海佛教復興中起有一定作用的知名居士尚有連任三、四、五屆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佛學書局董事長等職的王一亭；曾任上海佛教淨業社社長的關綱之和聞蘭亭；曾任第一屆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的周舜卿；曾任第二屆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上海佛教淨業社董事長等職的施省之；曾主編《佛學半月刊》的余了翁；曾任大法輪書局經理的蘇慧純；曾任上海佛教青年會理事長、《覺訊》月刊發行人方子藩和曾任世界佛教居士林總務部長及副林長、上海佛教公墓經理的李經緯等。

（完）

（上接第38頁「虛雲禪語」）

打七

打七，是剋期取證的好方法，始於宋朝，大興於清朝。傳雍正皇帝曾在宮裏打七，在他手下悟道的有十餘人，揚州高旻寺的天慧徹祖是其中之一。禪門的規章法則經過他的整頓，才宗風大振。

打七，就如儒生入考場，依題作文。禪者如能七天在禪堂裏，把疑情參透，把命根坐斷，即同如來。因此禪堂，又名選佛場，亦名般若堂。在這裏學的是無為法，即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為。若有所為，皆有生滅；若有可得，便有可失。

水陸緣起

釋尊在靈山會上說此法門，阿難尊者在林間習定，見一鬼王，求佛普渡，佛因為說水陸之法。此鬼王乃觀世音菩薩化身，憐憫幽冥地獄衆生，備受諸苦，故請如來開設水陸法門。何謂水陸？水者江河湖沼，陸者高低丘陵。水陸包含虛空。凡有色相，不能離此三者。

我國水陸法會始於梁武帝。梁武帝請誌公和尚起水陸大齋，發菩提心，制定水陸儀軌，極為真誠，利益昭著。傳說當臘燭熄後，梁武帝一禮，燈燭盡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空中雨花，水陸之功德，有如此者。

唐朝法海寺英公禪師，啓建水陸，超度秦莊襄王，范睢穰侯，白起王龍羽，張儀，軫昧等沉淪千餘年者，均藉此超昇。宋蘇東坡居士、明蓮池大師等歷代聖賢，均加補充，儀軌益臻完備。萬法唯心所造，大家有誠心，必有感應。可見水陸一法，在中國與禪門淵源有自。

（未完）